

叁 这位著名的教育学大师，十分客气地称呼弟子为先生



虞和平与自己的博士生导师、史学泰斗章开沅合影。

桂子山，位于武昌南湖之滨。1952年，搬迁而来的华中师范大学，将这占地2000多亩的山拥入怀里。老一代华师人都记得，山上慢慢种满了桂树，山下的学子，种子一般一拨一拨撒遍全国各地。

现在，除一年一度的9月桂花节，校园里还有一道人文的风景：细心的人会发现，一个90岁的老人时常四处散步。他，就是辛亥革命史学泰斗——学界著名的“章门”缔造者章开沅。30年前的1986年，虞和平获得章开沅的青睐，经过投书自荐和考试，成为一名章门弟子。

两年后，虞和平完成赖以成名的博士论文，重回近代史研究所，成为那里的第一个博士。

初读章开沅写给虞和平的一篇序言时，我颇为惊讶。这位著名的教育学大师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、二届评议组成员、召集人，十分客气地称呼弟子为先生——章开沅在学术上最不习惯和最不喜欢的，就是客气。据说，一些已成名多年甚至地位显赫的弟子见了老师既亲热又发怵。

他说，虞和平先生多年以来，勤于搜求资料，潜心理论探讨，已经有多方面的专题研究成果问世，或属于史料编辑，或属于人物研究，或属于社团剖析，或属于理论框架，大多都能给读者新的启发，颇得中外学者的好评。

这一评价，类似于一个导师给即将出关的学生写的一个毕业鉴定。其中，我尤其注意到“或属于史料编辑”和“或属于理论框架”这两句。因为，上帝给了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两根拐棍，一个是史料编纂，一个是理论研究。缺少了史料，这样一个学科将再次陷入虚无缥缈而无谓的玄哲之争。

在我看来，事实是最高级的哲学，也是最真的思想。如果展开说，可以这么表述，过去缺席是历史的本质属性，由于时间的单向流动性或不可逆性，我们注定无法重回现场，只能借助一些媒介来完成对过去的追忆。

遗迹、文字或更宏观而言的史料，是我们实现集体记忆、通往时间逆旅的渡口。“不仅关系到事件，而且关系到那些事件可以被表明呈现出来的可能的关系系列。这些关系系列并非内在于事件本身之中；它们只存在于对其进行反思的历史学家的内心之中”，海德·怀特在讨论历史学时，给予了历史学家偏于神性的界定。

我们可以不认同他的立场，但无法否认历史学家身兼思想家的角色。

2009年，虞和平开始了修行式的“宅男”生活。

无数个日日夜夜，我看见他在电脑前端坐如老僧，电脑换了几个，他还是保持同样的姿势。知了在他的窗前鸣叫了6次，树影浓了又稀了。

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这种“坐”功的崇敬，还是老实巴实地记下流水账吧：

他编辑《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》影印本，成书457册、32万页，单单位目录就123969条、270万字。

其间，还主编了1037册《中国抗战史料丛刊》，合65万页，收书刊4400册。

我知道，虞和平对这样一个数据是否能占据吉尼斯一角了无兴趣，但必须肯定，他在自己和自己较劲的过程中，登上了个人事业的第二座高峰。

某天，虞和平忽然对我说，他发现了张之洞的“密探”。这句话提醒了我，编辑这样一部大部头不是剪刀加浆糊，而需要一字一个地认真校读。他又无不遗憾地叹息，写论文的时间被一张张档案填满了。

这件小事我觉得有必要记载，就写在了自己的评论集《纸别裁》里；可惜，虞和平先生因公务繁忙，不能专文研究，而是囑我阅读茅海建的成果，并微信告诉我，上海、北京、天津等地都有张氏的密探。

我完全理解出版社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担忧，出版社理想更要市场。

虞和平是理想主义的，他夜以继日地赶路，不是沉浸在自以为是的幻觉里，而是企图还世界一个清晰的答案。

我觉得有必要更正一种偏见，阐述哲理的才是思想家，整理资料的不是，多么固执而执拗的误会啊。

历史已不再满足于一种叙述方式，而是为多种叙述提供基本的素材，正是一页页档案的拼接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故事或图谱。

在这些档案前，我更愿意将虞和平形容为机器人，他放弃利用编纂技法提供一种“隐喻性描绘”——这是预设的，也是真实/历史的最大敌人，他原原本本地将档案摆出来而不是考证、论述和分析。

他的分析工作已经在现代化范式中完成了，而不需要再次矫情地证明自己的敏锐和深邃。史料学功夫位于思想史食物链的顶端，还有什么比提供完整、充盈的素材更富于挑战性和富于超越性价值呢？

1967年7月下旬，虞和平和弟弟去一家农场打工。晚上，这个未来中国故事的解释者住在猪圈里。他颇引以为自豪地回忆：偌大一个猪舍，就我们两人住，倒也自在方便。

自在和勤劳似乎是虞和平一生的基调。福柯在《规训与惩罚》中认为，知识具有权力——只是这种权力碰到硬邦邦的中国现实，可以听到清晰的、破碎的声音。

在书斋中，一种知识分子的无力感和使命感交替在他的心里蔓延，他努力保持着对中国现代化的想象力，也努力在档案室里寻找晦暗的旧式中国的影子。

但这种努力丝毫没有改变个人为数不多的嗜好和兴趣，他在自己的斗室或微小的世界里泡一杯茶，安静地敲击开某人的信札或日记，间或玩玩把空当接龙的游戏。

虞和平最热衷的游戏，就是钻进文字里，寻找和重新理解悲伤的、深沉的和舒朗的中国痕迹。

这是一个精神游荡者的世界，他能出得来，我们，却进不去。

贰 历史是人类留给自己的遗嘱，只有虞和平这样的学人才会认真继承

1973年秋天，虞和平在北京大学开始了人生第二个起点。

北大校园是一条均衡的时间分界线，是虞和平的，也是中国学术的。这一年，北京的街头还没有沙尘、浓雾和拥挤的人群，批判和揭露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，现代化大幕的开启尚为远方霞光。

虞和平对这些并不陌生。1966年11月11日，这个在浙江宁波市镇海县大碇区出生、长大的青年人，已经爬上火车一路北上，到了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。

事后，他回忆说，那天很冷，没穿袜子。这个细节意味着，在人的心里，只有寒冷是真实的。

1976年，虞和平再也不会回到村里干会计了，他以正式工作人员的身份，挺胸走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大门；面前的道路上铺满了日子砌成的方砖，也铺满了一个个亟待破题的陈年旧识。

对数字的天然敏感，让他陷入各种表格中。谁都知道，从数字中拎出清晰的形象，是一门高超的手艺。

嗣后40年，这位“手艺人”栖居在晚清名臣荣禄的府邸里，与这个世界进行复杂而隐秘的对话。

东厂胡同一号楼，黎元洪的住宅，这一旧一新、一帝制一共和的替代，似乎预示着虞和平推动的“革命化-现代化”范式变迁，是多么巧合而又入情入理。

虞和平从不批评人，也不批判人，他对范式的更改是“蹑手蹑脚”的。

作为一个历史学家，他比一般人都认同布洛赫“有意的史料”的道理。真正的历史学，是解释的，而不是事实的——后者归属于考古学，承认这点和否认这点，同样悲哀而无助。

翻开一部部史书，我们所看到的史料，都归属于解释，一种言说的技巧。

这一点，詹金说得更加透彻：历史学家们近似于神秘地永远能从他们对“过去”的造访中带回他们想要的历史。

在他眼里，历史作品使用的是形式与体裁被严格规定的语言，并且永远是由一连串修辞工具与文体象征构成的。

中国重史，不是重史料，而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，即侯旭东所说，传世的史书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控制、引导和限制后人认识过去的工具，并大体操控了人们的历史记忆。

虞和平不一定认同“史书出、史料亡”的论调，但一定相信，范式也好，分期也罢，都是一种寻求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叙事结构。

进入北大20年后的1993年，45岁的虞和平才出版了第一部独立著作《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》，这无异于一枚巨型炸弹。人们忽然发现，一向死气沉沉的商会研究，被虞和平将四周的围墙轰为平地了。

当一些机构忙着把奖项颁给这部作品时，虞和平已悄悄调转了航向。似乎，他出现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唯一目的，就是改变集体性说话方式，让一种更多元、更纯粹的言说渗入火种中。

更大变化在2001年，当他主编的3卷本《中国现代化历程》历时7年问世，学界发现这个个头不高、温文尔雅的人，已成了以“现代化范式”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实践者。

这个称呼一定让他惶恐而退缩，因为人们遗忘了这样一个事实：1993年，同时点燃现代化范式导火索的有3个人：一个是他的授课老师罗荣渠，一个是他的授业恩师章开沅，他们分别拿着《现代化新论》《比较中的审视：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》，试图营救陷入僵化和绝境境地的历史解释方式，虞和平还是后一本书的作者之一。

不过，需要提醒一句：虞和平的现代化范式不是排斥而是包容了革命化范式，这是一种叙事技巧还是一种开放性，我还没有确切的答案。

壹 他成了以『现代化范式』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实践者

一个传薪者的精神谱系

虞和平

人物简介

虞和平，男，汉族，浙江宁波人，1948年9月生，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，历史学博士。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二级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、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。



封面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新资讯

封面 本封面新闻 浏览封面新闻APP www.thecover.cn